

「古典詩學文獻的當代詮釋學意義」 研討座談會會議綜述

蘇文伶*

一、前言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名譽教授張漢良於 2017 年 6 月 10-11 日在臺大校史館召開並主持了科技部行遠計畫專書「古典詩學文獻的當代詮釋學意義」(NSC 102-2420-H-002-047-MY5) 研討座談會。此項研討會係遵照科技部要求履行合約規定而召開的，應邀參加的有國內各院校和大陸地區學者十人，與會者事先皆研讀了專書所涉及的柏拉圖《斐德洛》篇 (*The Phaedrus*)、《會飲》篇 (*The Symposium*) 和《克拉提婁斯》篇 (*The Cratylus*)，並分別提筆撰寫論文。會中亦延請臺大古希臘文學者范吉歐 (Vassilis Vagios) 發表專題演講。

多年期的行遠計畫為科技部首發試辦，目的在獎勵資深和退休人文社會學者以專書形式貢獻畢生所學，試辦第一期獲得補助的學者有二人，人文和社會學科領域各一，故具有開先河的象徵意義。甫在張漢良教授專書完稿之際，與會者得以藉研討會的召開率先拜讀書中目錄、序和第十二章〈《克拉提婁斯》篇的名實之辯與現代符號學涵義〉。序中詳盡說明「詮釋」深義，間接成為此研討會最佳註腳。重返古典文獻，不為古典而古典，而為開啟對話空間，建構每一時空特定的詮釋視域。眾多「前文本」自成系譜，重新梳理古典文獻的論述脈絡，猶如還原羊皮卷上歷時累積的層層複寫；而在重讀中，文本實踐又衍生新的文本實踐，宛如種子播散落地帶來新生。以下，筆者將根據環繞著柏拉圖這三篇對話錄所發表的論文作綜述。

二、《克拉提婁斯》篇

張漢良教授專書第十二章從符號學觀點重新檢視《克拉提婁斯》篇的名實爭

*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議。全文聚焦於“*σῶμα* [soma]”（身體）和“*σημα* [sema]”（符號）這一對同源詞的討論，以此作為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和柏拉圖交會的關鍵點。蘇格拉底提到 *σῶμα* 和 *σημα* 因發音接近，而衍生為同義詞：「身體」可顯現「精神」狀態，例如因焦慮而頭疼，是一種「符號」，即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所說的指標符號。索緒爾在早年札記中也提到 *σῶμα* 和 *σημα*。他特別釐清「符號」為語音（身體）和語義（精神）中介，並不同「身體」。名實爭議於是轉換為「符號」問題。「專有名詞」有如「逆書符」(*anagramme*) 詩謎，並不表義，但謎底常為表義的「潛書符」(*hypogramme*)，有如別名或綽號。可見如同柏拉圖，對索緒爾而言，名實關係是否正確，並非僅取決於「任意性」。

范吉歐認為柏拉圖時代對詞源學（etymology）的認知與當代不同。當代的詞源學在索緒爾之前強調歷時研究。「詞源學」的希臘字根為 *ἔτιμος*（“true”，「真實」），因此柏拉圖時代關注的不是歷史，而是名實是否相符。但因為當時認為命名者皆有神性，所謂「真實」指的是諸神世界的真實；越貼近神諭，越「正確」。職是之故，荷馬時代普遍將專名視為人物命運的寓言（allegory），到了柏拉圖才有系統性的整理與討論名實問題。

中國醫藥大學徐金雲將柏拉圖《克拉提婁斯》篇裡有關專有名詞的論爭置於當代分析哲學的脈絡中。她指出赫摩給內斯（Hermogenes）的約定主義接近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描述主義，主張正確的名稱應呈現事物本質；而克拉提婁斯的自然主義則較接近克里普克（Saul Kripke）透過「剛性指稱詞」提出的「因果—歷史鎖鏈」理論，強調「後驗的必然性」。傳統「詞」「物」符應的知識論議題，在當代已轉換至以「論述主體」為中心的語用層面。在《克拉提婁斯》篇中蘇格拉底最後傾向折衷主義，但柏拉圖諷刺的敘事手法似乎暗示這個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中原大學吳碩禹將名詞視為符號，以索緒爾符號學觀點重新剖析《克拉提婁斯》篇。她認為柏拉圖雖已觸及現代符號概念，但其論述仍有局限。蘇格拉底主張符號必須仿擬事物本質才得以生成。當語言只能依附在物理現實上，未能自成獨立符號體系，名詞並未具有符號演繹效力。此外，蘇格拉底的詞源分析，看似解碼，實為編碼。他所指稱的「名詞」（例如荷馬史詩裡的人名），代表的並非個人，而是一整個故事，甚至一套價值觀。從神到人的分類，再到身心靈的詞源分析，柏拉圖藉蘇氏之口，將命名這項技藝收編於本體論之中。由此可見，符號意義並不在物本身，而在主體與主體所在的符號系統中。

中央研究院林熙強指出「聲音」在《克拉梯樓斯篇》裡，雖不顯眼但卻很重要。無論是深信名詞是「約定俗成」的赫摩給內斯或「自然生成」的克拉梯樓斯，蘇格拉底與這兩位對談者都將語音視為符徵，認為「聲音」是命名最初的媒介，名詞乃是一種藉由聽覺呈現的模仿。不過，蘇格拉底認為這樣的模仿絕非「擬聲」，真正的模仿乃是以聲音組成的音節模仿事物的本質。

三、《會飲》篇

清華大學陳傳興認為《會飲》通篇是一個「套層結構」(*mis en abîme*)，這個繁複的敘事結構像是一個「有孔隙、不停滴漏、無法填滿」的時間容器。除了各種線性時間指涉，陳傳興受精神分析和列維納斯 (Emmanuel Lévinas) 啟發，指出《會飲》篇中至少還有另外兩種時間。其一是他者 (*Autre*) 時間。從言說 (*dire*) 和所言 (*dit*) 的差異中，主體驚奇地發現被壓抑的自我創傷，他者時間由此裂縫中開展。序言裡的第三種時間是神諭時間。第二段序言開頭的 *Ex archés* (「開端」174a)，指涉宗教一神話周而復始的循環時間。世俗經驗與神諭時間的連結，代表由個人記憶走向理念 (*idée*)。《會飲》序言裡的異質時間，如潛藏在華衣內裡皺褶中他者的翻轉暴力，不時發出動搖意識主體的巨大聲響。

中央大學易鵬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詮釋《會飲》篇。他以納伯可夫 (Vladimir Nabokov) 的小說《幽冥的火》(*Pale Fire*) 與莎士比亞的戲劇《雅典的泰門》(*Timon of Athens*) 之間重疊交錯的互文關係作為類比，檢視《會飲》篇中同一母題與故事類型如何在其他文本中反覆出現而相互呼應或變調衍異。此外，以書寫文字呈現的對話中更匯集了各類手稿、常識 (*sensus communis*) 與樣板表演 (*epideixis*) 等現成物件。由於夾雜了這些斷簡殘篇，對話錄結構不免鬆散，但隨機拼湊有因時制宜的實用功能 (*phronesis*)；而眾聲喧譁也有助於逃脫修辭獨白的操控。各種互文元素的複製與衍異，經由不同的組合變化，開展成一奇幻的詮釋空間。

四、《斐德洛》篇

華東師範大學韓蕾認為巴爾特 (Roland Barthes) 在《片段集：愛的言談》(*A Lover's Discourse: Fragments*) 中呈現的「愛欲修辭學」是對柏拉圖「精神導引」(*psychagogie*) 的模仿和發展。在柏拉圖的《斐德洛》和《會飲》篇中，愛的話語

成為通向真理的途徑。蘇格拉底說，能使靈魂和話語達到應和的修辭術才是真正的精神導引。而「精神導引」需要借助愛來實現。愛的本質就是中介，愛人與被愛者可在欲求中被導引。這樣的導引是雙向而非單向的，巴爾特稱之為「教育學／教學法」(*pédagogie*)的導引。這顯示巴爾特所認同的修辭學並不是以說服他人為目的，而是觀點與觀點之間的對話。這也呼應了巴爾特後期對閱讀的開放態度。

銘傳大學蔡仁傑在論文中探討《斐德洛》篇裡修辭的拓撲空間。此篇場景隱藏了一個空間隱喻：蘇格拉底走出城外，意味著哲學的跨界，而此跨界不只拓展了修辭，更開放了哲學的疆域。蘇格拉底於對話中提出的戰車寓言尤為詮釋關鍵。戰車的移動、升騰、迴轉、沉淪等意象，串聯了對話中各種可能的空間形式。蘇氏跟著斐德洛出城，雖表面上成為他者，卻逐漸地帶領他超越物質空間的囿限，走向形上學的道路。看似哲學去畛域化的空間行旅，實為收編修辭的再畛域化移動。

復旦大學陶艷柯從基拉爾(René Girard)的「模仿欲望」理論觀點闡釋《斐德洛》篇。在基拉爾的欲望三角關係中，主體與客體之間隔著模體／介體，主體渴求的是介體，客體不過是達到介體的手段。在斐德洛的修辭學習中，其模體經歷了一種轉換：從呂西斯轉向蘇格拉底，也從最初對詭辯學派的讚賞轉向對辯證修辭術的認同。因與欲望緊密關聯，語言在這個轉換過程中具有關鍵作用。

輔仁大學蘇文伶認為《斐德洛》篇裡闡述的辯證範式(*paradeigma*)可視為柏拉圖的隱喻理論。柏拉圖著作中有兩種「範式」。一為模型，例如以編織、釣魚或打獵比喻政治。二為典範。《斐德洛》篇裡的辯證範式作為一種認識理型的方法，就屬於理論典範。柏拉圖的辯證範式包括「劃分」和「綜合」兩部分。前者可運用在喻體和喻依的劃分拆解，但《斐德洛》篇裡對於「綜合」語焉不詳。對於隱喻字源裡的「位移」與「越界」等涵義，以及「互動」理論所描述的「語意撞擊」，幾乎都沒有觸及，對於分析或了解隱喻助益有限。

五、總結

閱讀古典文獻最大的難度在於必須跨越文化和時空鴻溝，與文本進行「互為主體」的對話。此次研討會，無論是符號學、修辭學、語言哲學或文本分析等取徑，與會者大抵都能突破柏拉圖研究既有框架，從自己的研究領域建立問題意識。綜觀與會者討論的議題與論述脈絡，其中最大的特點便是都深受現代符

號學影響而經歷「語言學轉向」。柏拉圖詩學著作裡的主要課題，例如《克拉提斐斯》篇的名實爭議、《會飲》篇的文本結構、《斐德洛》篇裡的「精神引導」，甚至「愛」，轉換成符號的問題後，就不再遙不可及了。